

深切怀念唐长孺教授

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唐长孺教授,因久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4年10月14日逝世,享年84岁。唐长孺教授自1944年受聘于武汉大学,到1994年遽归道山,在我校执教整整半个世纪,将自己的卓越才识全部奉献给了武汉大学,奉献给了我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唐长孺教授学术成就卓著,誉播海内外。他的逝世,使我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为缅怀唐长孺教授,本刊特发表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全体老师为悼念他而撰写的一组论文。因本期篇幅所限,朱雷、黄惠贤、陈国灿、卢开万、牟发松老师的论文第五期刊发。

著书敢期延岁月,湖山倘许小盘桓

——唐长孺教授学术成就及治学方法略述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唐长孺教授1911年7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在多所中学任教。1940年任上海光华大学讲师。1942年赴湘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副教授。1944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副教授(1946年晋升为教授),此后一直执教于武汉大学。

唐长孺教授早年治辽金元史,曾发表《辽史天祚纪证释》、《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兴废及政治影响》、《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等多篇论文,所得结论在民族史研究中具有广泛的意义。

4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要致力于中国三至九世纪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1955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60年代、80年代分别问世的《论丛续编》和《拾遗》等多部著作,对这一历史时期中许多前人未及或者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不仅得出系列极富启迪性的新结论,广为国内外学者称引,而且开辟了一大批颇具研究潜力的新课题,惠及后学。当年《论丛》初出,海内外反响强烈,日本相继刊出多篇书评,台湾学者甚至冒着犯禁的危险,纷纷研读、引用此书。他所著《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居丛稿》,也在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长孺教授主持点校的二十四史中的北朝四史,代表了他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他凭着深厚的学术积累,过人的见识,加之对南北朝史实烂熟于胸,因而能够充分利用前人成果,进而发前人之所未发,道前人之所未道。传本《魏书》礼、刑二志中有的因文字似乎衔接,却实有脱叶,从来无人察觉,他根据《册府元龟》、《通典》增补,仅一处即补脱文达数百字之多。北朝四史的“校勘记”,以及他的《唐书兵志笺证》等专著,为研究者提供了经过缜密考校的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引发出新的研究成果。中华书局悼挽唐教授的唁电中称:“长孺先生曾三次来京为中华书局点校廿四史,先后完成了《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的点校,众所公认,这是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和范本。”由于他对中国古籍的深厚造诣,严谨科学的学风,被聘为国务院古籍规划委员会委员。

唐长孺教授在研究中历来重视出土文物、文献资料。1975年由他倡议,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他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出任组长、主编、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主持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在京十易寒暑,终告完成,所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业已全部出齐。10年心血,无私奉献,使沉睡千年的古冢遗文经过科学整理及时公之于中外学人,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荣获国家古籍整理特别奖。他曾与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同志一起驱车到新疆库车考察,由于路途颠簸,高度近视的右眼眼底出血,造成晶体浑浊,竟至失明。他为开创吐鲁番学这一新的学科,提高我国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水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0年,唐长孺教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中国历史卷副主编,隋唐五代史分卷主编。1988年,他主持承担国家七五重点社科项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系列研究”。曾先后主编出版了13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两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等多种史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荣获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他还以80高龄,抱病之身,对其毕生的研究,进行了理论性概括,结集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提出了自己对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前期发展过程的独特见解。与此同时,他还发起组织了古代长江中游经济开发研究讨论会,推进了长江流域开发史的研究。

唐长孺教授治学,深受前辈学者吕思勉、陈寅恪和李剑农诸先生的影响。他早在光华大学附中念书时,就曾慕名“偷听”过吕思勉教授为大学生开的“史学通论”课;后因在中学讲授历史,又研读了吕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对书中体现出的深厚学识和进化史观倾慕不已。当他在光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吕先生是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遂得以向吕先生时时请益。吕先生学尚通博,长于综合,能从浩繁的史料中理出头绪,融会贯通,而且十分注意当时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最早强调“用新方法整理国故”。他的进化史观在当时也是很先进的史学思想。唐教授早年治辽金元史,始终注意民族问题,实与吕先生在研究中强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有关;而唐教授治史敏于洞察历史事件的源流和演变,潜心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则是继承和发展了吕先生强调研究人类社会沿革,以“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的历史发展观点。

唐教授来到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后,由于教学所需,专业转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也正在此时,陈寅恪先生研究中古史的两部划时代巨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相继发表。陈先生既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章具有通识,又通晓多种外文,熟悉西方思想、学术及研究方法,因而能够兼摄中西史法,交叉多种学科,得以从魏晋隋唐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寻出主次,追溯源流,探明其内在的因果联系。陈先生治史,虽

从大处着眼，却每从小处着手，从一些人所常见、不为注意的“小”问题出发，引伸推论，融会贯通，因小见大，察微知著，最后得出前所未见、事关全局的重大结论。唐长孺教授在蓝田师院讲授六朝隋唐史时，认真钻研了陈先生的论著，并深受其影响。

读唐教授《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可见其研究方法，极得陈先生因小见大之旨。该文根据史籍所载赵至为游学而“阳狂”、出走，离家之后在邺、山阳两次改名换姓，又欲亡命吴国，最后竟远离父母家乡而落籍辽西等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进行深入考释，逐层剥离历史尘埃的遮蔽，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追究内在的联系，以不足5000字的篇幅，将曹魏士家制度的具体内容和严酷，完整清晰而又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

陈先生治史讲究“见人所常见发人所未发”，这同样见之于唐教授的著述。《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东晋时褚裒向孙盛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以“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听完后说“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历来引用这一段来说明南北学风的学者都以为褚、孙、支所谈的南北就相当于以后南北朝的界限。唐教授以详确的考证，揭示出这里的南北乃是指大河南北，与《隋书儒林传》序所云南朝时期“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南北，在范围上是不同的。孙盛所谓“南人学问清通简要”，系指魏晋时期流行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大河以南的玄学，当时大河以北流行的仍是汉儒经说传注，江南的学风亦接近于河北。直至晋室东迁以后，京洛玄学新风才南移建康。这个问题的正确辨析，究明了六朝时期学风的变化和文化地理的改观。

陈先生治中古史注重民族和文化问题，强调文化在民族融合、社会政治特别是统治集团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唐长孺教授不主文化史观，但就研究领域而言，始终重视民族和文化问题，如关于孙吴时江南的山越、魏晋的杂胡、晋末北境各族“变乱”及“五胡政权”、拓拔族的汉化与拓拔国家的建立、北魏末期的山胡敕勒起义等，以及关于魏晋玄学、南北学风、南朝文化的北传等，唐教授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所得结论极富开创性和启迪性，广为国内外学者所称引。

陈先生是从理论上全面而科学地对“敦煌学”进行概括的第一人。他预见敦煌学将成为当代世界学术的新潮流，号召中国学者积极“预流”，并身体力行，将敦煌文书运用于史学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47年，唐长孺教授即发表《敦煌所出郡姓残叶题记》，对新兴的敦煌学表现出异常的学术敏感。50年代，他开始通过缩微胶卷抄录有关敦煌资料，以之运用于魏晋隋唐史研究，先后撰写并发表了数篇论文。70年代，他积极推动、亲自主持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并在深入钻研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基础上，将文书与传世文献资料巧妙结合，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参据有关文献，深入探讨了西州诸乡帐中所反映的西州境内奴婢、部曲在人口中所占比重以及奴婢、部曲数量的彼此升降；又如通过对出土高昌官文书中僚属押衙的系统研究，结合史籍文献所载，揭示了高昌郡行政体制与内地的一致；再如对中日学者已反复研究过的敦煌所出眉县尉判集，他凭借对文献资料的充分掌握，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防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所撰有关论文除参用沙州、西州文书外，还间用有关简牍资料，相得益彰，如论述高昌郡军事制度中的屯戍制。总之，唐教授关于出土文书的研究，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敦煌吐鲁番地区历史的认识，而且拓宽了六朝隋唐史的研究视野。

唐长孺教授的史学研究，对陈寅恪先生的继承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方法论上，而不仅仅是研究的问题和范围。唐教授仙逝后，著名史学家周一良、田余庆教授合制挽联云：“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义宁即陈寅恪先生。日本汉学权威所编《中国史研

究入门》共列举了七位最有影响的六朝史专家,首举已故陈寅恪先生,其次即是唐教授,在当时健在的六位学者中名列第一,适为此联注脚。

学术上的继承重在发展,科学的生命正在于创新。唐长孺教授对吕、陈二先生的继承,正是表现为在两位先生的研究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吕思勉先生治史,基于进化论的历史发展观,对社会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经济组织的发展变革亦颇留意。陈寅恪先生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成系统的文化史观,但其文化涵括甚广,亦包括经济制度。他在论述唐代财政制度的变化,以及对北魏迁都洛阳与营建新都的分析,都特别强调经济原因。陈先生富于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使他的研究并不囿于文化史观。唐长孺教授在史学研究中很早就注意经济问题,最初是得益于李剑农先生的影响。唐教授在蓝田师院时,李先生也在那里执教,后来又在武汉大学长期共事。抗战时唐教授有次去拜见李先生,李先生正在桐油灯下撰著《中国经济史稿》。后来唐教授多次向李先生请教经济史问题,并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研究经济史。

解放后,唐教授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觉运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指导治史。他在其成名作《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中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是他经过艰苦的探索和长期的研究实践之后,发自内心的甘苦之言和经验之谈。《论丛》中《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一文,即是他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拓跋族社会发展的力作。唐教授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的诸多方面,如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土地和赋税制度、兵制和门阀政治、民族问题、宗教及文化问题等等,都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果,卓然成一家之言。《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出版后,唐教授曾寄送给陈寅恪先生请教,陈先生在回信中说:“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给予极高评价。唐教授能取得这样高的学术成就,与他在历史观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分不开的。但他的论著很少大段征引经典作家语录,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解剖具体的历史问题,并以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成果,令人信服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唐长孺教授每研究一个问题,必广泛搜集和详细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博于征引而慎下论断。但唐教授长于考证,却又不止于考证,更不为考证而考证,而是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证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他所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即是其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理论性概括,也是他长期思索本段历史发展规律而形成的一系列新见的结晶。唐教授从分析两汉以来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即“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入手,论证了自己的“魏晋封建论”,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以及奴隶社会的特殊性,即在于中国始终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国家的阶级性从两汉到魏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国家的政体形式却没有变。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基本赋役对象是自耕农,因而封建制的国家却要限制地主土地上的佃客数量,一如奴隶制国家要限制奴隶数量。其中对唐代南朝化倾向问题的系统论述,则是对中国封建前期社会发展趋势的新的探索。《三论》问世不久,即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初版很快销售一空,它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国三至九世纪史的研究。

唐长孺教授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为他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被公认为当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他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等学术职务。他先后两次应邀赴

日讲学和参加国际会议。80年代以来，不少海外中青年学者慕名前来，请益问学于唐教授；他促成了多批日本专家学者来校进行学术访问或国际合作研究，对促进中日两国史学界之间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同时，还担任过多种社会行政职务，曾两度出任历史系主任，被选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湖北省副主委及中央委员。

唐长孺教授长期着意于人材培养和资料建设，对中青年学者既热情扶植，又以严格著称。由他创办并担任所长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是首批中国古代史博士点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点，已初步形成一支结构完整实力较强的学术梯队。他又是一位优秀的科研组织者和学术带头人，所主持的许多重大国家科研项目，如吐鲁番文书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的编纂等，都圆满完成了任务。他担任主编，必亲自审读全书，字斟句酌，动笔修改。在主持整理和主编吐鲁番文书时，每份卷子的释读、拼接，每件文书的断代、拟题及注释，均由他亲自过目，最后裁夺。他最不愿意当挂名主编或空头顾问。

唐长孺教授幼受庭训，攻习诗词，在旧体诗词方面得到系统而严格的训练，20余岁即发表过诗词，极得著名诗人金松岑欣赏。金评论其诗“幽涩似郊、岛，又似永嘉四灵，亦受散原影响”，但金又认为“长吉鬼才，非少年所宜”，劝唐教授若改治历史，尽其才用，成就必不可限量。其后，唐教授遂专攻史学，虽常以诗词寄情抒怀，酬唱于挚友，却绝少公开公表，又为史名所掩，故其诗才鲜为人知。启功先生诗集《启功韵语》附录有唐教授《一萼红》一阙，极见情致、意境与功力。唐教授亦工书法，善联语，爱好并精于昆曲、京剧与围棋。

唐长孺教授一生潜心学术，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忧国忧民，疾恶如仇；求真务实，勇于探索。晚年虽目力衰竭，病魔缠身，仍笔耕不辍。“著书敢期延岁月，湖山倘许小盘桓”，是唐教授自题并请启功先生手书的一幅联语，表达了他对人生的通达和对学术的执着。虽岁华不与，湖山吝情，但唐教授的学术成就，良师风范，将同他为之毕生奋斗的学术事业一起永世长存。

唐教授病逝的噩耗传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等有关单位和学术团体，北京大学历史系等数十所大专院校的历史系、所，日本唐代史研究会、日本青年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宫崎市定、谷川道雄、池田温、堀敏一、砺波护、菊池英夫、布目潮风、佐竹靖彦、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田余庆、缪钺、任继愈、启功、何兹全、杨向奎、杨志玖、胡如雷等海内外知名学者纷纷来电来函痛悼。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先生在挽电中称：“唐长孺教授生前，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方面，建树了卓越的业绩。他的治学方法及其研究成果，是留给日中两国史学界的一笔永恒的遗产。唐长孺教授的名字与他的业绩将永远被载入20世纪的史册。”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先生在唁电中称颂唐教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我们日本中国史同行最尊敬的师长。他的学术及其为人将永远为我们日本学者所怀念”。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唐史研究会会长池田温先生电传挽联“六朝隋唐 发挥史识 高昌文书 开拓新域”，概括了唐长孺教授在学术上的主要业绩。北京大学周一良、田余庆教授合制的挽联，本校李国平教授所制并亲书的挽幛，都深情赞颂了唐教授的道德文章。

（牟发松执笔，经朱雷、黄惠贤审定）

（责任编辑 吴友法）